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4卷 第1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

论北岛诗歌中的庄重诗美及其局限

讽物、观理与宋诗的“理趣”

士与俳优：《毛颖传》中的两个传统

《琵琶行》语象的图像演绎

连环画图像叙事刍议

Birth of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Pei Tao's Poems and Its Limits

A Study on Poems on Judging Nature and Thinking on Nature Which Reflect "Li Qu" in Song Poetry

Intellectuals and Fools: The Two Traditions in the Biography of Brushes

Image Illustrations of Song of a Pipa Player

Opinions on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 of Story-Pictures



南京大学出版社

CSSCI集刊

文学评论丛刊

【第14卷 第1期】

主办 |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学评论》编辑部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评论丛刊. 第14卷. 第1期 / 周勋初, 陆建德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305-09559-7

I. ①文… II. ①周…②陆…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丛刊 IV. ①I20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115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文学评论丛刊(第 14 卷第 1 期)

主 编 周勋初 陆建德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75 字数 359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559-7

定 价 33.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文学评论丛刊》编委会

主 编	周勋初	陆建德			
副主 编	赵宪章	高建平	丁 帆	徐兴无	董之林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王彬彬	左 健	张伯伟	
	周 宪	周勋初	金鑫荣	陆建德	
	赵宪章	胡星亮	高小康	高建平	
	莫砺锋	徐兴无	董之林	董 晓	
	董 健				
执行编委	徐兴无				

目 录

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	李新宇(1)
“现代的立场”:朱自清的别一种“背影”·····	施 龙(14)
鲁迅的道路	
——重述鲁迅与 80 年代的“现代文学”·····	黄 平(24)
沈从文诗性思维探析 ·····	王 昉(36)
空间叙事、现代性主体与失序时代的性别	
——冯沅君小说论 ·····	汪剑豪(43)
论北岛诗歌中的庄重诗美及其局限 ·····	傅元峰(50)
“伤痕”文本内外的共谋与异质 ·····	王 琮(58)
水性·诗性·神性·人性	
——文学史视野中曹文轩小说之女性诗学 ·····	王玉琴(68)
从网络文化看打工文学的转型 ·····	江腊生(76)
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新时期戏剧发展与反思	
——关于“戏剧观”论争 ·····	徐 震(82)
※ ※ ※	
汉魏两晋哀辞探析 ·····	赵厚均(91)
《诗经》与中国上古人的“耳饰” ·····	王 政(98)
关于“白莲社”本事及陶渊明年谱中相关问题的考述·····	郭 鹏(105)
齐梁诗歌语言转向的形式审美·····	韩 仪(111)
初唐七言排律合律时间补论·····	龚祖培(120)
通行本《长恨歌传》应为白居易手定说阐微·····	殷祝胜(123)
讽物、观理与宋诗的“理趣” ·····	谢 琰(130)
士与俳优:《毛颖传》中的两个传统 ·····	景凯旋(138)
《昭昧詹言》:在批评中建立的桐城诗学 ·····	龚 敏(148)
鲁一同与桐城派关系探微·····	郝润华 杜学林(158)
※ ※ ※	
语境还原:“文学性”问题的发生 ·····	李 龙(167)
《琵琶行》语象的图像演绎·····	刘 望(175)

连环画图像叙事刍议·····	沈其旺(184)
蔡仪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学术价值和贡献·····	胡 俊(200)
乔治·桑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	宋 旻(210)

※ ※ ※

至宋始是真文字

——评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	韩 伟(215)
---------------------	----------

地域、文体和学术视域中的清代骈文研究力作

——读曹虹、陈曙文、倪惠颖著《清代常州骈文研究》·····	吕双伟(219)
-------------------------------	----------

Contents

On the Birth of Chinese Modern Intellectuals	Li Xinyu(1)
The Modern Position: Another Illustration of Zhu Ziqing's "The Sight of Back"	Shi Long(14)
The Trace of Lu Xun —Revisiting Lu Xun and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in 1980s	Huang Ping(24)
On Shen Congwen's Poetic Thinking	Wang Fang(36)
Space Narration, Modernity Subject and Gender of Disorder Times —On Feng Yuanjun's Novels	Wang Jianhao(43)
An Discussion on the Grave Aesthetics of Pei Tao's Poems and Its Limits	Fu Yuanfeng(50)
The Conspiracy and Heterogeneity Factors Inside and Outside "Hurts Generation Literature" Text	Wang Qiong(58)
Aqueous, Poetry, Divinity, Humanity —Feminine Poetics of Cao Wenxuan's Novels in the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Wang Yuqin(68)
A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Work of Literature in the View of Internet Culture	Jiang Lasheng(76)
The Development and Introspection of "New Era Drama"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Theory —About the Delate of "Drama View"	Xu Zhen(82)
※ ※ ※	
An Analysis of Laments in Han, Wei and Jin Dynasties	Zhao Houjun(91)
<i>The Book of Songs</i>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Earrings"	Wang Zheng(98)
On the Original Facts of the Bailian League and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Chronicle of Tao Yuanming's Life	Guo Peng(105)
Formal Aesthetics in Qi and Liang Dynasties and Their Turns to Poetic Language	Han Yi(111)

- A Supplementary Discussion on the Time of Seven-Word Extended Law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Gong Zupei(120)
- The Common Edition of *Changhenggezhuang* Should Be Revised by Bai Juyi
..... Yin Zhusheng(123)
- A Study on Poems on Judging Nature and Thinking on Nature Which Reflect “Li Qu” in Song Poetry Xie Yan(130)
- Intellectuals and Fools: The Two Traditions in *the Biography of Brushes*
..... Jing Kaixuan(138)
- Zhao Mei Zhan Yan*: To Found Tong Cheng Poetics out of Criticism ... Gong Min(148)
-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Yitong and the Tong Cheng School
..... Hao Runhua & Du Xuelin(158)
- ※ ※ ※
- The Origin of the Literariness Li Long(167)
- Image Illustrations of *Song of a Pipa Player* Liu Wang(175)
- Opinions on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tory-Pictures Shen Qiwan(184)
- The Academic Value and Contributions of Cai Yi Marxist Aesthetics Thoughts
..... Hu Jun(200)
- The Translation and Influence of George Sand in China Song Yang(210)
- ※ ※ ※
- The Real Prose in the Song Dynasty
—A Review on *The Study on Song Prose* Written by Yang Qingcun
..... Han Wei(215)
- The Study Masterpieces of Qing Dynasty Parrel Prose in the View of Region, Style and Academy
—Review Cao Hong, Chen Shuwen and Ni Huiying’s *The Study on Parrel Prose of Changzhou in Qing Dynasty* Lü Shuangwei(219)

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

李新宇

一、在帝国黄昏中醒来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由中国传统文人蜕变而来的。从蜕变的开始,到最先的现代知识分子出现,这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因此,要谈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就不能不回顾中国文人固有的传统与19世纪中期之后它所面对的新变局及由此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中国传统文人继承的传统并不单一,但毫无疑问,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系统。关于儒家的学说,一些学者喜欢强调其“仁”的内容,但事实上,“仁”在儒家学说中并不是目的,而是为“礼”所用,目的是实现一种理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秩序。所以,儒家学说的历代传人都很少像西方学者那样去思考宇宙本源、生命本体、终极目标以及彼岸世界的问题,而是主要致力于如何把生活着的人们安排在某种秩序之中,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无疑是一种稳定秩序的文化,也是一种一厢情愿地追求安定团结的文化。

如果深入追究,一切传统都有其历史成因,任何思想都打着它所产生的和形成的那个时代的印记。儒家文化之所以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其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形成时期(也就是中国文化奠基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者都无法离开他所直接面对的问题。面对周王朝礼制秩序的崩溃,文人也许不必那样痛心于“礼崩乐坏”,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尽管秩序稳定并不意味着百姓生活的状态良好,“国泰”也并不意味着“民安”,但是,“国泰民安”并非毫无意义的词语组合,而是体现着全部既有经验基础上的朴素认识。在古代历史上,社会秩序的动荡总是严重地破坏着人们的生活,给人们带来各种痛苦。尽管社会稳定不过是使人“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它毕竟比“想做奴隶而不得”要好得多。因此,富于责任感的文人理所当然地要把稳定或重建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使命。仅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就有理由对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充满敬意。然而,儒家学说和整个中国文化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上奠基了,基础决定了思想体系的整个建构,也决定了它的基本特色和功能。人们很容易发现儒家学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特殊命运:每一种政治力量在致力于推翻旧统治的时候,几乎都要“反孔”;而在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后,又几乎都要“尊孔”。儒家学说与一代又一代统治者一拍即合,而与“革命”却总有点格格不入。客观地说,这种稳定秩序的努力不

可磨灭,因为它致力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建构而不赞成以杀戮维持的暴政。尽管他们的设计与实际的历史实践相去甚远,但作为一种设计和导向,总比那些煽动人们相互仇杀的学说要好得多。

但是,这种稳定高于一切的保守主义的文化传统与专制主义的政治相结合,对文人人格的影响是消极的,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它使中国文人(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形成了一种与现代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特点——致力于维持秩序而不是致力于变革现实。从历史发展中各种力量构成的功能系统看,知识分子的使命主要不在于维修旧秩序,也不在于装饰新秩序,而在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探索,并以防止文明的僵死和老化,保持发展和进步的活力。因为历史是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和稳定中发展的,文明是在不断扬弃既有文化中进步的,所以,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主要使命不是简单地继承和传播,而是以批判的方式掀动积淀、激活历史并寻找更美好的生存可能。儒家学说培养起来的传统文人却与这种使命背道而驰。自从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先秦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的景观再也没有出现。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没有天才,但一代又一代天才的学者都满足于注释经典,却很少有人去写出新的经典。他们往往只考虑继承和弘扬而不考虑发展和更新。因为在他们看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社会并不需要发展。何况,帝国是那样强大,四周皆是落后的蛮夷,没有危机,没有挑战,自然不需要考虑变革。

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惊醒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千年好梦。无论国人以怎样的义愤谴责列强不仁不义,都不能改变中国已经远远落后的事实。在这种事实面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意识到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被迫开始思考,从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他们翻译西方资料,了解世界大势,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这时的中国士大夫文人觉悟相当有限,但“睁开眼睛”的意义是重要的,从《海国图志》、《环瀛志略》、《海国四说》等著作对西方国家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赞美,可以看到一个观念深处的变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已被打破,承载中国道统的士大夫文人在两千年中形成的自信已经动摇。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和中国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终于认识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彻底过去了,至圣留下的经书和传统武库中的库存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个世界。对于中国传统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对于中国文人来说,这是一个蜕变的起点。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王朝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借法富强”的道路,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处于体制中心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们,更关心的当然是清王朝的兴衰和安危,但作为一种直接后果,他们设立新式学堂,设立编译馆,译介外国科学和技术,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也培养了一代人。而且,正是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人们进一步与西方文明接触,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体制的种种弊端,在比较之下,产生了制度变革的要求。郑观应、王韬、郭嵩涛等都对中国传统体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开始揭露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病,提出了“君民共主”、“君民共治”以及开设议院和立宪的主张。更为重要的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药方开了一大堆,然而,等待大清帝国的却仍然是一次次的惨败。甲午海战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大清王朝的忠实臣民心头流血,也更坚定了一些士大夫文人变法图存的决心。要救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学外国,学外国不能只是学其技术,向西方拿来不能只是拿来其坚船利炮,而是必须同时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理念。于是,清王朝被迫开始的改革终于从经济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文人有了新的觉醒,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萌芽开始钻出地面。

在这个过程中,维新派的地位非常重要。与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相比,康有为、梁启超们的努力已不再只是为一个衰老的体制进补。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改革方案事实上已经动摇着传统。他们的活动方式也已与历代士大夫文人不同。在主流意识形态虽然面临危机却依然坚守的情况下,在顽固派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废”的情况下,他们在思想上已经离经叛道,在行为上已经违背祖制。

尽管康有为本人最终也难以成为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在中国文人的蜕变史上,他的影响不可低估。1890年,他开始在万木草堂向他的学生系统地表述他对儒家学说的新解释。而在此时,他的手中已经有一部早在六年前(光绪十年)就开始写作的书稿《人类公理》,也就是后来的《大同书》。此书虽然写成之后一直秘不示人,但在他的学生中却并非秘密。《大同书》的理想无疑是离经叛道的。它对于未来社会的设计,比如全世界只有一个总政府,政府皆由民选,以及没有国家、没有家族、没有婚姻的设想,事实上已经是“无君无父”。虽然康有为本人并不主张立即实行,但对长期处于思想禁锢中的中国文人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冲击。1891年,康有为写成《新学伪经考》并立即刊行。在儒学的历史上,古文经典的真实性早就受到怀疑,但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系统地陈述,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要把古文经学彻底送入坟墓。康有为指出:整个古文经学派所依据的经典都是刘歆伪造的。这些伪造的东西被东汉的一些著名学者接受下来,使一代又一代学者成为刘歆的牺牲品。第二年(1892年),在他的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下,康有为完成了《孔子改制考》,虽然这本书直到1898年才刊行,但在刊行之前,在其弟子中已有广泛影响。该书指出,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开始于东周,关于东周之前的历史是不可靠的。东周时期的一些人开始创办学校,宣讲他们自己的思想,但他们总是用想象的历史论证他们的理想,或以虚构的古代圣贤作为自己的依据。康有为认为,六经都是孔子做的,体现着他的改革蓝图,然而,孔子却要声称六经继承了尧、舜和周公的传统。同时,康有为引用公羊学说的三统三世理论,认为每一世都有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适合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合于升平世;共和政府适合于太平世。经过这样一番努力,孔子就成了一位伟大的制度革新者,而不再是制度变革的障碍。

关于康有为的学说,梁启超作过如此评价:“《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伪造,《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1]

几乎与此同时,严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且开始对中国思想界发生重大影响。面对甲午之败,体察中国的沉痾,严复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文章,通过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比较,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体制,介绍西方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介绍西方“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的人权意识。严复发现,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是人的自由。他说:“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2]他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富强的原因在制度,而制度的真谛在“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

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严复已经意识到个人是现代伦理的出发点。为了开民智,他主张大力引进西学,在教育体制上废科举、设学堂,在教学思想上则要像西方那样:“其教子弟也,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4]他主张改变国民的不自由状态,还要确立个人利益的神圣性,确立以国民之私为本的治国之道。他写道:“顾处士(炎武)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5]由此可见,当时的严复已经知道议会民主和地方自治是救治中国的唯一出路,而且要用来自西方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取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无论如何,这些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现代性转化作用不可低估。这种思想的传播以极大的力量动摇着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奠定了新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基础。

考察1898年变法之前的维新派挣脱传统束缚并走向自由思想的程度,谭嗣同和梁启超也是不可忽视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慷慨就义,留下了他的遗著《仁学》。在这部著作中,谭嗣同发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呐喊。他的思想已经危及专制制度和儒家学说的一些根本。他一改尊古之风,对传统给予猛烈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下了这样的总评语:“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他向名教宣战,向纲常宣战,要打破一切传统的束缚;他反对虚伪的道德,力主人欲的解放;他不但反对君主专制而崇尚民治,而且认为天地之间不应该有国家存在,梦想着世界大同。

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追随其师研究经学,认为“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6]。也就是说,过去两千年里人们所接受的孔子学说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学说,而是荀子的学说。在康有为那里,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非孔子之学;在梁启超这里,古文今文皆荀子之学,都非孔子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传统学问的瓦解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彻底。在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对君主专制的批判等各个方面,梁启超都远远超出了康有为的思想。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897年秋,梁启超离开上海来到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他的教学情况很值得注意。关于这些情况,梁启超自己有过回忆:

已而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讲课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掎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7]

由此可见,当时的梁启超的确已经走得很远。他甚至曾经上书巡抚陈宝箴,认为如果不能鼓动朝廷实行改革,就脱离中央而宣布湖南独立,重建一个新湖南。《初稿》,第一册,

45—46 页。)这时的梁启超,与革命派并无太大的差别。

由此可见,至少是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虽然没有离开旧的体制,但思想已经不受其拘牵。

关于维新派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过程中的影响,值得注意的不仅是他们的思想言论,而且还有他们的活动方式。在一次次给皇帝上书难以上达的情况下,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思路,以开报馆、组学会、办学堂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有力地扩大了影响。他们创办强学会,一些大臣都参加或支持: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发起人之一;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拨给经费;张之洞、刘坤一都捐资资助;李鸿章要捐两千银元加入,结果还因其甲午战败之后的名声不好被拒绝。除强学会外,他们还先后组织过粤学会、蜀学会、关学会、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知耻会……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就创办了《中外纪闻》,每月一册,随《京报》分送在京的官员。《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停刊之后,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在澳门创办《新知报》,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在长沙创办《湘报》和《湘学报》。《时务报》曾发行 17000 份,以极大的力量扩大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这是文人社会参与的一种新形式,它以特别的力量推进着新思潮,为知识分子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当时的反对派曾经如此描述它的影响:“虽以僻寂荒城,独无分局,而皆辗转丐托,千里递寄,数人得共阅一编,资为课程。”^[8]正因为这样,“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9]。

然而,19 世纪末的中国现实使维新派的志士们很难摇身一变即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需要相应的环境,当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离现代还相当遥远的时候,当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因素都还远远没有进入现代的时候,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困难的。中国走向现代的关键是走出专制主义的传统,然而,对于维新志士们来说,改变专制传统的活动却必然要受制于专制制度。就像洋务派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成为专制体制的经济保障一样,维新派虽然触及体制问题,但在体制内所能做的,也只是旧框架下的修修补补。他们提出过一些新的口号,但常常就连他们自己也往往没有打算实行。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几千年的观念重负,而且在于他们当时还不可能完全离开传统文人几千年一贯的人生道路。千年的环境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在环境没有彻底改变之前,个人人格的彻底改变是困难的。

现代知识分子需要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没有获得独立地位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获得独立意识。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位的获得,我们不能不注意 20 世纪之初那些影响知识分子生存并改变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和紧接而来的辛亥革命对国家体制的冲击与改变。

二、从戊戌到辛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

百日维新惨败之后,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倒退时期。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之外,戊戌新政几乎全部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往往以柔顺取容,走向保守,正如有人所描述的:“杀才六人,已寒支那之胆;变甫数月,咸死衿纓之心。北京士夫,戒谈国事;膠庠学子,群咏太平。”^[10]然而,考察清末知识分子成长的历史,这却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因

为在这一背景上,至少有几件事值得注意:一是屠杀与抓捕使一些维新派人士成了流亡者,被迫走上了独立之路;二是清王朝最终也没有避免实行新政,从而创造了有利于现代知识分子长成的环境;三是大批留学生在异国的环境中接受了新思潮的冲击,迅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化。

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残酷镇压戊戌变法,本以为便可保持大清江山的稳定,却未想到西方列强会以各种方式干预大清的內政。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公然站在“维新乱党”一边,甚至要干预皇帝的废立。朝廷杀的是中国人,要废的是中国皇帝,需要外国人说三道四吗?这就加剧了清王朝与列强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慈禧向列强宣战,也必然导致了八国联军进驻北京。经过庚子之乱这一戏剧化的过程,让人意想不到的,慈禧太后一下子变成了改革者。维新派因为改革而被杀、被关或者逃亡海外,而他们的改革计划却在慈禧手中一一得到实现。1901年,慈禧就下了“罪己诏”,摇身一变成为变法的领袖,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中与鼓励私人企业、改革军制一起提出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除科举、设立学堂、鼓励出国留学。他们实行改革的当然不过是为了缓和矛盾、延长旧统治的寿命。当康有为们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改良的时候,他们是无法容忍的;当人们因为和平渐进的路径已被阻塞而不得不走向暴力革命的时候,他们却愿意进行改革了。这大概是一个规律,不到最后的关头,统治者总是不愿意妥协。而当他们决心做出妥协的时候,常常为时已晚。但无论如何,清末新政造就了思想文化上的新环境。在这其中,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都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关系重大。

1.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读书人的新状态

如果放在前现代的历史上考察,应该说科举制是一个不错的制度。它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平民子弟也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因而打破了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一、它把读书人紧紧系于仕途,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之下,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阶层的预备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学问不过是敲门砖,读书不过是进入仕途的手段,而目的是做官。所以,思想和行为都要适合于官场的规范,养成了对官场和经典的双重依附。二、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形式,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严重限制了人们思想的活力。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和试帖诗。童试首场、乡试首场、会试首场的八股文都是在四书中抽取词句为题,乡试和会试第二场的八股文则以五经的词句为题。考生必须顺着两千多年之前讲这些话的人的思路,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作,这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代古人说话,就只能讲古人知道的事,八股文不能涉及孔孟以后的情况。因而“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11]。在明代,八股文末尾还有“大结”,允许考生自由发挥,触及现实,字数从几十到一百不等。到清朝康熙年间,八股文的“大结”被取消,更失去了唯一有可能稍作自由发挥之处。^[12]试帖诗是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增加的考试内容。它的特点是完全脱离现实,高度形式化。一般都是从前代的经、史、子、集中抽取一些词语为题。音韵和用典都有严格要求,动辄犯忌。作者不能议论褒贬,抒发己见。这种考试有利于培养思想僵化的卫道官员,却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能敲开官场的大门,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淘汰的读书人因为这种训练,也很难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落第的考生像失意的官员一样虽然常常表现出某种批判意识,但那往往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委屈和牢骚。对于被淘汰者而言,他们的出路不外两种:一是躲进山林,成为超脱世俗的“隐者”;二是设馆授徒,从事基础教育。对于前者而言,出世又有真假之别,真出世者已经无须谈起,因为他们事实上已从社会消失;假出世者的“终南捷径”最后仍然直指庙堂。对于后者而言,由于读书以科举为目的,教育与官场紧密连接。在政教合一的科举教育体制之下,塾师所能做的,不过是机械地传授规定的知识。科举杠杆限制了教育的独立性,教育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即使偶尔有些萌芽,其思想成果也得不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诞生的。

废除科举制本是维新运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议题并未因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长期拖延。就在1901年1月清廷宣布改革并且号召大臣提出建议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奏章,建议重新推行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学和改革考试措施,要求逐渐废除科举。1901年8月,朝廷命令废除八股考试,科举、岁科试和童试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制度进行。9月,朝廷又命令切实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按戊戌变法时的规定将书院改为学堂。此后几年中,经过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一再请求,朝廷于1904年1月宣布,从1906年起逐年减少科举名额,到1912年将所有名额都拨归新式学校毕业生。在重重危机面前,张之洞、袁世凯等深感逐步废除科举的方案为时已晚,因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朝廷最后终于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在1905年9月宣布所有乡试、会试、岁试和科试一律停止。于是,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制的废除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意义重大:首先,它切断了读书人与八股一经典—国家体制的必然联系,使读书人的前途不再系于经书和官场。当然,一些读书人的确为此后的道路感到茫然,为十年寒窗的奋斗目标突然消失而无比痛苦,但是,失落和痛苦却伴随着某种解放。他们不必再进行八股文的训练,不必再死守经典,不必再为生存而拥挤于科举这座独木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陌生的新道路。其次,它改变了教育状况,使中国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化。在科举时代,即使是“私塾”,也只具有一个私人性的办学形式,而教学内容必须是国家指定的。“四书”“五经”是固定的教材,教师的讲解不能离经叛道,因而不可能通过教学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科举制废除之后,情形就不同了,学校的培养目标不再只是官员预备队,而是各方面的人才;教学内容自然不再只是经书,而是包括了来自西方的许多学科。办学堂以西方为榜样,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教学内容丰富而自由。中国的学堂虽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这种独立,但它毕竟不同于以往的科举,因而使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独立创造和传播的空间。

然而,仅仅废除科举是不够的,看一看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学堂的情景,我们就会看到,国家规定大学堂毕业相当于进士,中学堂毕业相当于举人,使学堂成了变相的科举。于是,过去读书是为了功名,现在上学堂依然是为了功名,国家权力的介入使学堂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成为独立自主地培养人才的地方。因此,学堂对科举的取代并未从根本上使中国文人获得解放,也不可能因此而使中国传统文人蜕变成现代知识分子。最先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于异国的土地上,国内知识分子的大面积成长需要等待专制制度的铲除。

2. 留学生在海外的成长

讨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不能不论及留学生群体。如果说国内读书人的蜕变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上开始的,那么,国外的留学生就具有更多的条件获得思想上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世纪之交,清王朝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聚集地。据统计,1901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300人,到1905年就达到了8000人,到1906年达到13000人。^[13]之所以大量聚集于日本,一来日本是变法成功的榜样,二来也由于日本是中国近邻,而且留学费用较低。据当时的人说,每年只需三百两银子。^[14]这些留学生并不都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来,而是与政府提倡留学并给予留学生的待遇有关。尤其是新政开始之后,朝廷已经明确宣布,科举三届裁完,出国留学显然是新的出路。对于清政府而言,派出留学生,目的本是为王朝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知识的服务人才,以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留学归来的绝大多数不是专制帝国的维护者,而是它的掘墓人。

留学生来到国外,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受到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冲击,而且直接面对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价值理念。这一切与他们熟悉的中国传统不同,但他们往往无法抵抗诱惑,因为比较是不可避免的,比较之后更难免要重新选择。因此,他们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必然产生了新的理想和追求。这从他们翻译和印行的著作就可以看到,比如,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社会学原理》、《女权篇》,达尔文的《天择篇》、《物竞篇》,赫黎胥的《天演论》,以及《美国独立战史》、《佛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华盛顿》、《林肯》、《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虚无党》……在这样一些著作影响下,无论他们本来具有什么样的基础,无论曾经如何打定主意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不受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最终都不能不接受一些现代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形成一些新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他们中的一些人本来也许曾经有过中央大国子民的自豪,也许曾经有过皇恩浩荡的感觉,但在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在现代国家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状态的比照下,那些自豪与恩典早已黯淡无光。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形成新的抱负,甚至以孟德斯鸠和卢梭自居,以罗伯斯庇尔和华盛顿自居,立志改变中国的社会,使自己的同胞也过上人的生活。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衰败的清王朝为了挽救自身的衰败而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回来的却不是自身命运的挽救者,而是与自身完全不同的一个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了他们,使他们告别古老传统,而开始了新的追求。

在世纪之交的特定背景上,奔赴海外的留学生不仅面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先进文明的诱惑,同时还面对两个特殊的因素:一是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的思想影响。变法失败之后,维新运动的活跃分子有的被杀,有的被关,有的被罢官或流放,留在国内的漏网之鱼也往往胆战心惊,在恐怖之中闭上了嘴。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到了国外,成为在列强帮助下得以幸存的“叛国者”。因为遭遇捕杀和驱赶,他们的确成了“丧家之犬”,与清王朝的依附关系被迫断裂。因此,在流亡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思想上也开始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终于在异国的文化环境中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他们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华侨和留学生是他们的主要宣传对象。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自1894年之后就在海外活动,进行反清革命的宣传。当留学生大量出现时,孙中

山也及时开始了在留学生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代学子在这样的背景上来到国外,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这两种力量的主要成员本身就是正在醒来的知识分子,而他们的宣传又进一步唤醒更多的人,使他们在异国自由的环境中从故国传统的禁锢中挣脱出来,形成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从传统的读书人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化。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由于变法的惨败,一些维新派的人士开始转向革命。比如,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秦力山等,本来都属维新派,而在这个时期,他们已经对清王朝不抱幻想。回顾这段历史,也许那一代人绝望之下的不合作态度未必是理智的,但对于谭嗣同们的追随者和同情者来说,清王朝表示愿意改良固然可喜,但跨过六君子的尸体而与刽子手们握手言和,继续维护他们的统治,却的确并非容易之事。和平改革需要条件,如果统治者手上还滴着鲜血,道义感就会驱使一些人拒绝接受“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好建议。正因为这样,一些维新派成员面对清王朝实行新政的诚恳姿态而仍然纷纷走向了革命。当历史过去之后,人们当然可以在反思中发现革命代价惨重,甚至因此而提出“告别革命”,但是,革命往往不是人为呼唤的结果,也不是说告别就能告别的。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正是顽固的统治者对维新派的镇压把中国逼上了革命之路。可以说,当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自己决定了自己最后被革命的命运。对于专制制度之下的臣民来说,走向革命,意味着从王朝体制内彻底独立了出来。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步。

1903年前后,留学生中的革命思潮开始波浪翻涌。他们不仅通过书报制造革命舆论,而且组织革命团体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作为重要的思想事件,最先以响亮的声音引人注目的是邹容。邹容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开始了《革命军》^[15]的写作。当时他只有17岁。因为不满于清政府派往日本的监督,他与张继等人剪掉了这位监督的辫子,被迫于1903年逃回上海。《革命军》在上海完成,由章太炎作序,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此书曾经风靡一时,章太炎说:“凡摹印二十有余反,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餐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16]因此,有人认为此书“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17]。在《革命军》中,邹容猛烈抨击专制制度,热情鼓吹革命,而且指出:“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坡拿里,为国民增祸乱。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他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腐朽、落后和残暴,主张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使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而成为国民。“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他赞美西方民主革命的成就,宣传自由、平等和人权的观念,展示了一个根据现代国家理念建立起来的中华共和国的蓝图:“一、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一、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一、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一、各人权利必要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一、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